Globethics Repository

##########################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U, Changxing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2-07 13:52:3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793

大秦景教研究述評

——歷史、語言、文本綜論（下）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Daqin Jingjiao: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Its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Text (II)

吳昶興

WU Chang Shing

作者簡介

吳昶興，臺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U Chang Shi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Email: wcsjohnson@gmail.com

Abstract

In line with the last issue, this paper would continue to solve the origi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Jingjiao which succeeds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They came to China in the title of "Bo-si Jiao" (Persian Religion) in Tang Dynasty for 110 years, and thereafter changed the title to "Daqin Jiao" by imperial edict in 745, the fourth year of Tian-bao, till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Daqin Jiao"'s developing history during Emperor Xuanzong to Emperor Dezong of Tang had retained its own documents more than those after mid of Tang Dynasty, but the Chinese rubbings, such like mortuary pillar and epitaph, were a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fill this blank pag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historiography of researches on Jingjiao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ncluding the apostolic succession of Jingjiao with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and interpretation and textual criticism on Jingjiao, etc. Those studies would help us obtain an overall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Daqin Jingjiao, Persian Religion, Daqin Religion, Epitaph

本文承上期探究景教之濫殤——叙利亞東方教會之後在亞洲的發展傳播。景教在7世紀初進入唐代中國，在唐太宗、高宗、武則天、玄宗時代以“波斯教”身分發展，在中國立足生根。天寶四年（745）玄宗為免其與其他波斯宗教相混，根據發源地賜景教新名“大秦教”。自此到唐末景教都以此為名。關於景教在唐中晚期流布的文獻留存極其有限，近年出土的墓誌、經幢可稍稍填補這段空白。新出土的石刻史料勾勒出景教在此時期傳播分布的大概面貌，這些新發現的石刻史料恐怕改寫了已知的景教歷史。本文將以這些新史料為依據。此外，過去中西學界對於景教文獻、文物的研究成果豐碩，本文最後將回顧與評述百餘年來的景教研究學術史，包括景教與叙利亞東方教會的統緒關係、景教文獻的刊布與各種詮解、考證等，以助於全面檢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若要更好地掌握景教發展的外貌，需對叙利亞東方教會的源流與神學先有認識與理解，衹有如此方能對景教歷史及其遺存的經典、史料有正確地解讀。

大秦教（745–845）概況

唐玄宗（天寶時期，742–756）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雲：“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内安置，賜絹百匹。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顔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宫修功德。”天寶元年（742），身兼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渤海郡公數職的高力士受唐玄宗指示向大秦寺送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

位皇帝的畫像[①]和絹布。天寶三年（744），從大秦國遠道而來的傳教士佶和覲見皇帝，同年皇帝下詔請來羅含、普論等17人聚於興慶宮修功德。[②] 前文所提及的阿羅本翻譯經書的“書殿”興慶宮亦為唐代皇室藏書之所。在肅宗年間任太常少卿並修國史的於休烈曾提及興慶宮：“《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核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③] 可見興慶宮在“安史之亂”以前為國史書及詩書等藏書庫。因此，羅含、普論等17人可能在此從事與阿羅本同樣的工作——譯經。

翌年（天寶四年），唐玄宗下詔：“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者，亦宜準此。”[④] 入唐以來的

[①]《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錄：“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貞觀之時景教已需要把皇帝畫像置放寺廟之內，天寶八年（749）杜甫所撰的《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中記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可見除景教以外，其他寺廟均懸掛唐帝王的畫像或因受中國的“君權神授”思想影響。另可參《太平廣記•卷二百一十二》，“老君廟”。[*Tai ping guang ji*, vol.212, s.v. “Laojun miao”.]

[②] 興慶宮位於唐代長安城東門春明門內，屬於長安外郭城的隆慶坊，原係唐玄宗登基前的藩邸，號稱五王子宅。先天元年（712），李隆基登基，避其諱改名興慶坊。開元二年（714），將其同父異母的四位兄弟的府邸遷往興慶坊以西、以北的鄰坊，將興慶坊改為興慶宮。“修功德”或是借當時佛教日常“禪”、“法”及“律”的概念，大概是景教修道的內容，可能相當於今日基督教的祈禱、讀經、靈修、禮拜等。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25頁，卷四“祠部郎中、員外郎”。[LI Linfu, et al., eds., *Tang liu dian*, vol.4, revised by CHEN Zhongf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125.]

[③]《新唐書•卷九十五•列傳二十九》。[*Xin tang shu*, vol.95, chapter 29.]

[④]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864頁，卷四十九“大秦寺”條。[WANG Pu, *Tang hui y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5), 864, s.v. “Daqinsi”.]

百年間，叙利亞東方教會一直被稱為“波斯教”，其經、寺、僧皆被冠上“波斯”之名。為何玄宗時期朝廷會有正名之舉？或許是因其常與另一波斯宗教“祆教”混淆。出自波斯薩珊王朝的“祆教”，為波斯國教，盛行於中亞，北魏南梁時期始名聞於中國。唐初對祆教頗為禮遇，兩京、磧西諸州皆有祆祠。[①] 時人不察會將祆教與景教混為一談，[②] 故正名為“大秦”，除明確了景教（基督教）之發源地，也避免了與祆教相混。[③]

唐肅宗（755–763）

自“安史之亂”發生後，長安、洛陽兩京失守，皇室官員遷往成都。天寶十四年（755）七月，唐肅宗李亨（711-762，在位756-762）即位於靈武，並以此作為大都督府。[④] 景教教衆隨着朝廷遷移，離開動亂的兩京，在靈武並其他四郡建寺，繼續傳教的工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今洛陽感德鄉栢仁村

[①] 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載《陳垣史學論着選》，陳樂素、陳智超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9–110頁。[CHEN Yuan, “A Study of the Entry of Zoroastrianism into China,” in *CHEN Yuan shi xue lun zhu xuan*, ed. CHEN Lesu and CHEN Zhicha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109-110.]

[②] 贊寧：《僧史略》卷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宗鑒：《釋門正統》卷四，《卍新纂續藏經》第七十五冊No. 1513；志盤：《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卷五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九冊No. 2035。參見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第126–129頁。

[③] 最明顯的例子，宋朝的姚寬：“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怯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參見姚寬：《西溪叢語》，載《西溪叢語，家世舊聞》，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2頁。[YAO Kuan, “Xi xi cong yu,” in *Xi xi cong yu, jia shi jiu wen*, punctuation collating by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42]

[④]《舊唐書•本紀十•肅宗》。

有新墓誌出土，該墓誌上題“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志銘”，其墓誌介紹墓主云：“公諱獻，字獻，靈武郡人也。祖諱移恕，考諱蘇鄰……常洗心事景尊，竭奉教理，為法中之柱礎，作徒侶之笙簧。而內修八景，外備三常，將證無元，永祗萬慮。”[①] 墓誌的主人名花獻（756-827），他正好出生於“安史之亂”爆發初期，靈武郡人，即今日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西南，是一位虔敬的景教徒，並且從其祖父以來，三代皆奉景教，這證明了肅宗時代景教在靈武郡傳教的成果，同時證實景教有漢人歸化的現象。

在平亂之際，出現了一景教僧人伊斯（Yazdhozid，叙利亞文ܝܙܕܗܘܙܝܕ）[②] 加入了郭子儀的部隊，為其搜集軍事情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對其有較多描述：“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捨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內，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翠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這段記載說明伊斯乃從吐火羅的巴爾赫城

[①] 郭茂育、趙水森編：《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第211–212頁，“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編號為53–1。[GUO Maoyu & ZHAO Shuisen, eds., *Luoyang chu tu yuan yang zhi ji lu*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2), 211-212, No. 53-1.]；毛陽光、余扶危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匯編（上下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546頁。“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獻）神道志銘”。[MAO Yangguang & YU Fuwei, eds., *Luoyang liu san Tangdai mu zhi hui bian*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3), 546, No. 272.]

[②] 有關伊斯的身分，以叙利亞文記載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正面最下部，其上說明立碑者為伊斯，亦有闡述有關其祖籍原屬地的內容。以伊斯作為參軍的身分來中原的吐火羅人，推估是至德元年（756）八月以後隨吐火羅軍來協助唐朝平亂。見《舊唐書•本紀十•肅宗》：“（至德元年）八月壬午……回紇、吐蕃遣使繼至，請和親，願助國討賊，皆宴賜遣之。

來至中原地區，以其全面的能力與才幹歷經肅宗、代宗、德宗三代，由他官銜來看，至少為正三品官。[①] 他最初效力於宮廷中，後被肅宗派於當時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697-781）那裏，擁有朔方節度副使的頭銜，負責都督軍統兵總管。在軍中他能於營帳卧室內親見郭子儀，但伊斯並無自覺有別於他人。他對於名利、仕途極為淡泊，有任何奉祿與饋贈不積蓄於家中，並將所獲之金銀財帛用於修繕大秦的寺宇及有關施捨行善的工作。

唐代宗（762–779）、唐德宗（779–805）

直到唐代宗李豫（726-779）登基第二年（廣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亂”結束，國內復歸太平。然而國勢日漸式微，邊陲與夷族的戰事加劇，賦稅嚴苛，宗教與國家賦稅及支出之間關係微妙，大曆十三年（778）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奏佛、道等宗教有關的僧尼穢雜亂象，指出國家供養僧尼開銷龐大，查察和敕令還俗帶來的增額相當於田租賦稅三分之一。[②]

依李叔明之見，唐德宗李適（742-805，在位779-805）即位針對寺廟舊有問題制定了更為嚴厲的管理政策，如寺、觀三等制（分上、中、下）來限制僧尼留住人數。另有都官員外郎彭偃提議規定僧尼每年領絹數量，對修道的年紀實施限齡。[③]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提到代宗與景教的關係云：“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此時，寺

[①] 伊斯的官銜“金紫光祿大夫”，為唐朝文官散位，屬於勛官，正三品文官。“金紫”為金質印章，紫色綬帶之意。邱樹森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59-260頁。[QIU Shusen, ed., *Zhongguo li dai zhi guan ci dian*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ress, 1991), 259-260.]

[②] 王溥：《唐會要》，第837-838頁，卷四十七“議釋教上”條。

[③]《新唐書•卷一百三十八•列傳七十二》。

廟祭祀之禮是依尚書祠部安排進行，凡皇帝及皇後誕辰之日，京城之寺廟道觀均設齋一天；國家忌日則兩京及外州寺廟道觀均設齋，州、縣持香爐巡行寺廟道觀；其所需用均由朝廷供給，包括私人寺廟，並為僧尼等提供香油、炭料等。[①]

唐德宗時，國家實際上慢慢步入衰弱，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言："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處，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德宗即位也祇能以九範[②]及八政[③]在財政上開源節流來力挽狂瀾，將國家的困境扭轉。德宗的改革，帶來景教較好的發展空間，而德宗的作為也較符合景教的宗教理念與實踐，得到了景教的認同。在建中二年（781），《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豎立於在長安大秦寺內，碑文由景教僧景淨所述，朝議郎前行臺州司士參軍呂秀岩書，景淨叙利亞名為阿當（Adam，叙利亞語ܐܕܡ），是秦尼斯坦教區（ܣܝܢܝܢ，指中國）的一名長老（Elder，叙利亞語ܩܫܝܫܐ）兼鄉主教（Chorbishop，叙利亞語ܟܘܪܒܝܫܘܦܐ），景教寫經《尊經》的按語稱他為"大德"[④]。景教碑文以序文體叙述景教在中國所經歷的大事記，並在最後有頌文復述序文中關於景教教義、在唐歷朝的發展歷史的內

---

①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第126–127頁，卷四"祠部郎中、員外郎"。

② 傳說大禹治理天下的九類大法，泛指治理天下的大法。《尚書 • 洪範》中"九範"指：五行（金、木、水、火、土）、敬用五事（言、貌、視、思、聽）、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禮、兵）、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歷數）、建用皇極（天性、天道）、又用三德（正直、剛克、柔克）、明用稽疑（卜筮）、念用庶徵（預兆徵象）、向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孝終命）及威用六極（凶、疾、憂、貧、惡、弱）。

③ 指八個施政方面。唐初諫官魏徵及虞世南等修編《群書治要》中收入西晉袁準的《袁子正書》卷五十有關"富國八政"，"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

④ "大德"：此稱謂於佛教的意思為高僧。對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體側面"大德曜輪"一名的叙利亞文部分，"大德"即等同今日一般稱作"主教"（Bishop）的身分。

容，最後表揚出仕的景教僧伊斯，並於碑尾題上遠在波斯總部的“法主寧恕”。碑文由當時授予檢校試太常卿[①] 的大秦寺寺主業利協助校對，因中國與景教波斯巴格達總部相距甚遠，中間又有阿拉伯帝國阻隔訊息不通，故未能得知法主僧寧恕（Hananiśo ，叙利亞語ܚܢܢܝܫܘܥ）早於立碑時間781年三年前（778）逝世，可見當時景教中國境內與波斯總部訊息傳遞至少需要三年。

景教碑的叙述者景淨，在貞元二年至四年間（786-788）曾與西明寺般若三藏法師翻譯胡本《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由於般若祇會梵文，不識胡語，初至中國亦未識漢文，故需景淨協助；但是景淨不識梵文，又不識佛法，故此翻譯的經文出現了歧義，因而引起佛門對景淨的批判，認為他表面承佛教之名實暗藏景教之法，借以宣傳景教，此事鬧得沸沸揚揚，最後唐德宗介入處理，云：“察其所譯理昧詞疏，且夫釋氏伽藍大秦僧寺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天人攸仰四衆知歸。”[②]

從上述的歷史記載來看，景淨的身分可能具有波斯或夷族的血統，故能熟識胡語，而天竺僧般若找上景淨，顯示在譯經上，景、佛可能存在着合作關係。由於《尊經》上的“按語”提及景淨譯經有三十部以上，從《尊經》所列譯經目錄及現存的《志玄安樂經》、《三威蒙度贊》、《宣元至本經》來看，其漢語水平極高，故其漢化已深，推估他可能為歸化唐室的胡人之後，在中土成長並習熟漢語，且略通儒、釋、道三教，但他可能書法不佳，所以最後是由呂秀岩代筆。

[①] 官從三品。在賴瑞和對唐代的檢校官制研究中認為“檢校”指負責的意思，配上“試太常卿”是武職所帶的試銜。另一方面，可能是“安史之亂”後的一種軍功獎或授予外族將領的封號。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官制》，載《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第184-185頁、第192-195頁。[LAI Sweefo, “On the Jianjiao Titles under the Tang Dynasty,” in *Chinese Studies*， vol. 24, no.1 (2006): 184-185, 192-195.]

[②] 圓照：《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上，p0756a21–27。[YUAN Zhao, *Datang Zhenyuan xu Kaiyuan shi jiao lu*, vol.1, p0756a21–27.]

唐憲宗至唐文宗（805–840）

公諱獻，字獻，靈武郡人也。……常洗心，事景尊。……內修八景，外備三常，將證無元，永祇萬慮。……為法中之柱礎，作徒侶之笙簧。……（《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①]

有關於景教在地方流布的情況，在唐憲宗及文宗時期，有墓誌與經幢可增補這方面歷史的空白。目前出土確認與景教有關的有米繼芬《大唐左神策軍故散副將游騎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兼試太常卿上柱國京兆米府君墓誌銘並序》、花獻《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花獻妻《唐故安氏夫人墓誌銘》及立《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經幢的“經幢記”等，這些石刻為吾人勾勒出了景教在中國地方發展的另一個面貌。

據米繼芬墓誌云：“公諱繼芬字繼芬，其父米國人也。……公有二男……幼曰僧惠圓，住大秦寺。”[②] 米繼芬的幼子為大秦寺僧侶；

[①] 墓志主人名花獻，下葬於唐文宗大和二年二月十六日（公元828年3月9日），墓誌全稱《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2010年底在洛陽東郊出土的，現由洛陽碑志拓片博物館收藏。郭茂育、趙水森編：《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圖版211、錄文212。毛陽光：《洛陽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獻及其妻安氏墓誌初探》，載《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第85-90頁；附墓志圖版。[MAO Yangguang, “A Study on the Epigraph of Nestorian Hua Xian and his Wife Ann of Tang Dynasty from Luoyang,” in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no. 2 (2014): 85-90; appendix with the rubbings of epigraph.]另見常書香：《洛陽市首次發現唐代景教徒墓誌》（2014年5月7日）刊於洛陽網，最後瀏覽2014年5月17日。 http://news.lyd.com.cn/system/2014/05/07/010318494.shtml。[CHANG Shuxiang, “Luoyang shi shou ci fa xian Tangdai Jingjiao tu mu zhi,” in *Luoyang Daily* (May 7, 2014), Accessed May 17, 2014, http://news.lyd.com.cn/system/2014/05/07/010318494.shtml]

[②] 墓誌主人名米繼芬，下葬於唐憲宗永貞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806年1月12日），墓誌全稱《大唐左神策軍故散副將游騎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兼試太常卿上柱國京兆米府君墓誌銘並序》，由鄉貢進士翟運撰文並書寫。1955年於陝西省西安市三橋出土。詳見葛承雍：《唐代長安一個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第181–186頁。[GE Chengyong, “Tangdai Zhangan yi ge Sute jia ting de Jingjiao xin yang,” in *Historical Research*, no.3 (2001):181-186.]

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經幢的幢記載有“大秦寺寺主法和玄應俗姓米、威儀大德玄慶俗姓米、九階大德志通俗姓康……檢校塋及莊家人昌兒，故題記之，其大和三年二月十六日壬寅，遷舉大事”[①] 字樣，這說明景教在中國發展的一個社會現象，首先，景教大德及僧侶不再如唐太宗、高宗、玄宗時期從波斯而來，保留叙利亞名，米繼芬的墓誌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經幢記裏的姓氏米氏及康氏應屬昭武九姓[②] 的區域族群，表示他們歸化於中國的粟特人。

至於花獻（756–827）的身分背景，毛陽光以敦煌文獻《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為證，雖在青州北海郡的望姓中找到花姓，但花獻的祖父名“移恕”，父名“蘇鄰”非漢人常見的名字，應是外夷人士；在榮新江研究中，靈武在隋唐時期是西北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軍事重鎮，是粟特人東遷的必經之地，唐朝早期在這地區也安置了隨同突厥歸降唐朝的粟特人。[③] 筆者的看法與毛、榮不同，花姓是漢姓，再從花獻墓誌提及祖、考名諱“移恕”、“蘇鄰”應為教名而非姓氏，這可能是突顯其家族是一重視景教信仰的家族，同時這個家族很可能是目前所發現歸化於景教的漢人。花獻祖父花移恕可在景教文本中找到出處，在景教寫本《序聽迷詩所經》中曾出現“移鼠”，《一神論》出現“翳數”，皆為耶穌在唐代的漢譯，移恕與移鼠音近，叙利亞語ܝܫܘܥ，讀音yešū，以救主名號做為教名極為特別。花獻之父為花蘇鄰，蘇鄰可能為今譯“所羅門”之叙利亞語ܫܠܡܘܢ，讀音

---

①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2006年5月出土洛陽東郊，經幢為紀念已亡人安國安氏太夫人及其師伯，經幢的述史部分與《大秦景教宣元至本》合錄，時間為唐文宗大和三年二月十六日（公元829年3月28日）遷葬於該處。

② 昭武九姓原定居葱嶺（今日之甘肅新疆）。詳見《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西域下》：“康者……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③ 毛陽光：《洛陽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獻及其妻安氏墓誌初探》，第86-87頁。

šlimoun，取其前兩音節。而花獻之名看來像是漢名，但按其祖與其父使用教名的習慣，“獻”恐怕也是教名，而不是漢名，故以叙利亞語推敲應為今譯“閃”的叙利亞文ܫܡ，讀音šim。[1] 花獻的祖上不重視祿位，淡泊名利，但花獻擁有“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低階的官銜，大致屬於基層的官員。

由出土文物記錄所提供的信息，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花獻及其妻安氏之墓誌所示安葬之處同為洛陽縣感德鄉栢仁村，[2] 這個村落是位處洛陽城外東南角的感德鄉村莊，[3] 這表示此地很可能是景教徒的墓葬區，這一帶亦可能存在景教徒的聚落。由於現階段數據並不充足，暫未能確認，但從前述之綫索可知景教在中土已經歷了一個轉變時期，由於音訊難以相通，及距離遙遠之故，景教的總部在中國傳教的支持難以為繼，傳教的工作漸漸為境内歸化的粟特人或極少數的漢人接續之前的傳教工作。

---

[1] 毛陽光另有看法，認為“蘇鄰”是摩尼出生地，又以漢譯摩尼教文獻稱耶穌為“夷數”推論花獻父祖具有摩尼宗教背景，極可能信仰摩尼教，見毛陽光：《洛陽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獻及其妻安氏墓誌初探》，第87頁。筆者對此看法保留，原因在於墓誌對花獻父祖淡泊名利的人品做了說明，然後又接着載明花獻的景教信仰，並未提及信仰轉變如此重大之事。

[2] 花獻與其妻安氏的墓誌内容正好修正了張乃翥推論為“栢仁裏”的說法，實際應是洛陽縣感德鄉柏仁村。有關墓誌内容可參2010年洛陽東郊出土的《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及《唐故安氏夫人墓誌銘》，分別收錄於郭茂育、趙水森編：《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第211-214頁。另見張乃翥：《跋洛陽新出土的一件景教石刻》，載《景教遺珍：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葛承雍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7頁。[ZHANG Naizhu, “Ba Luoyang xin chu tu de yi jian Tangdai Jingjiao shi ke,” in *Precious Nestorian Relic: Studies on the Nestorian Stone Pillar of the Tang Dynasty Recently Discovered in Luoya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 7.]

[3] 趙振華、何漢儒：《唐代洛陽鄉裏村方位初探》，載《洛陽出土墓誌研究文集》，趙振華主編，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第96頁。[ZHAO Zhenhua & HE Hanru, “Tangdai Luoyang xiang li cun fang wei chu tan,” in *Luoyang chu tu mu zhi yan jiu wen ji,* ed. ZHAO Zhenhua (Beijing: Morning Glory Publishers, 2002), 96.]

另有兩方墓誌《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波斯君丘之銘》（以下簡稱《阿羅撼墓誌》）與《大唐故隴西郡李公墓誌銘並序》（以下簡稱《李素墓誌》）或許有論者認為與景教有關，但筆者對此持保留觀點，故不置於景教的歷史脈絡中做討論，理由如下：

一、《阿羅撼墓誌》最早被編錄於端方（1861-1911）《陶齋藏石記》中，[①] 碑上有一段云："宣傳聖教，實稱蕃心。"據此推論"聖教"即指"景教"，以及把"拂林國招慰大使"的"拂林國"等同於地理上的東羅馬，再將阿羅撼等同於景教碑上的"大德羅含"。此論最矛盾的地方是，羅含來華的時間與阿羅憾的生平不符，[②] 就前述所言，天寶三年（744）羅含與普論、佶和一起覲見皇帝，而阿羅憾早於710年已經過世，不可能出現在天寶三年，顯見兩人非同一人。馬小鶴從西域區域史的視角，得出阿羅憾的身分是與唐朝聯盟的蕃王有關，[③] 故阿羅憾並非景教徒。

[①] 端方附有在史籍考究部分，從官品及時期估計是卑路斯父子、從召諸蕃建天樞一事則估是武三思，而端方在考查亦有所保留，但卻被後來部份學者直接引用。端方：《陶齋藏石記》，載《石刻史料新編》，第11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2年，第8187-8188頁。[DUAN Fang, "Taozhai cang shi ji," in *Shi ke shi liao xin bian*, vol. 11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Co., 1982), 8187-8188.]

[②] 據羅香林考證"阿羅憾丘銘"，其人於顯慶（公元656–660年）中入唐，即高宗時曾充"拂林國招慰大使"，宣傳聖教、武宗時召集諸蕃在唐首領營造天樞，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卒於洛陽之阿羅憾。羅香林：《景教徒阿羅憾等為武則天皇後營造頌德天樞考》，載《清華學報》，新1卷，第3期，1958年9月，第13-24頁。[LO Hsiang-Lin, "The Sung-Te Tien-Shu Built by the Nestorian, Abraham, and Others in Honor of the Empress Wu Tse-Tien," i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new vol. 1, no. 1 (September 1958): 13-24.]後收錄於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年，第57-69頁。[LO Hsiang-Lin, Nestorianism in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Hong Kong: Zhonghuo xue she, 1966), 57-69.]

[③]《阿羅撼墓誌》考證的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詳見馬小鶴：《唐代波斯國大酋長阿羅憾墓誌考》，載《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38-578頁。[MA Xiaohe, "Tangdai Bosiguo da qiu zhang Aluohan mu zhi kao," in *Manichaean Studies and Ancient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38-578.]

二、《李素墓誌》榮新江認為其為景教徒有兩個原因：一是與景教碑側上的叙利亞名字“僧文貞”與李素之表字“文貞”相同；二是李素其子均以“景”字輩命名。[①] 但這兩個理由實過於牽強，景教碑上的僧名不少是常用漢名“福壽”、“敬德”、“昭德”、“文明”等，實不能據此即推論其為景教徒；再者，其名字中有“景”一字，因而就是景教徒，也屬較為大膽的推論。對比《花獻墓誌》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未必與“景”有關的名字，但在墓誌上仍有跡可循有找到景教信仰的叙述，而李素墓誌全無如上的叙述，實難證明李素是景教徒。

唐武宗至哀帝（840–907）

武宗即位（840）時，一直承襲從德宗以來着唐朝内憂外患的問題，而武宗對於夷族問題尤為敏感。會昌三年（842）二月，河東節度使劉沔把回紇人驅趕至國境邊陲地方，隨即而來是下令對兩京的回紇及摩尼寺莊宅、錢物等沒收。同一時期，禁絕百官在京城設立私廟。[②]

到會昌五年（844）四月，武宗敕令祠部查冊天下寺及僧尼人數，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七月，敕令對上州的工作不入流、破落寺廟廢止，忌日祭祀改於道觀；兩京祇留佛寺兩所，留寺僧三十人。同月僧尼不再隸屬祠部管理，改屬鴻臚寺之下；若為外國人則送回所屬國家。至八月報告：“其天下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

[①] 榮新江：《一個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載《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2集，葉奕良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8-89頁。[RONG Xinjiang, “Yi ge ru shi Tangchao de Bosi Jingjiao jia zu,” in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vol. 2, ed.YE Yili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88-89.]

[②] 《舊唐書•本紀十八上•武宗》；《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一•列傳一百四十二下•回鶻下》；另參王溥：《唐會要》，第864頁，卷四十九“摩尼寺”條。

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驅游惰不業之徒，已逾十萬。”[①] 史官對武宗毀佛的評價甚高，因為這麼做可說破除了危害中國文化之異俗：“……於是削浮圖之法，懲游惰之民……況身毒西來之教，向欲千祀，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祝發之鄉，久習而莫知其醜，以吐火吞刀之戲，乍觀而便以為神，安可正以咸韶，律之以章甫……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②] 景教因為武宗的宗教政策，遭受到池魚之殃被迫關閉。

然而，武宗此舉看似嚴重衝擊宗教，但其實維持的時間並不長，會昌五年七月宣布的禁教令，翌年武宗三月崩殂，到了五月唐宣宗便大赦天下、復僧尼，一改武宗的政策，故此武宗的宗教禁令，實際僅實行了十個月隨即告終。

真正衝擊景教的恐怕是唐僖宗（874-887）在位期間的黃巢起義。黃巢起義使景教受到嚴重打擊，無以為繼。波斯細剌夫（Siraf）人阿布賽德•哈散（Abu Zayd Hassan）所寫的《中國印度見聞錄》（*Akhbar al-Sin wa' l-Hind*）的第二卷記載了黃巢事變中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祆教徒被殺一事：“……有一個近期到過中國的人改變了書中陳述的某些情況，他特別指出，這個國家的整個形勢，旅行安全和對外貿易的方便條件，皆因一次大叛亂而改變，這次叛亂的首領是班蘇（黃巢），他首進軍坎府（廣州），這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也是阿拉伯

[①]《舊唐書•本紀十八上•武宗》。另參《新唐書•卷五十八•志四十二•食貨二》：“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

[②]《舊唐書•本紀十八上•武宗》。

商人聚集的一個港口。……對這個城市圍攻持續很長時期，這次圍攻發生在回曆紀元264年（公元877或878年）。最後他成為這個城市的主人，殺死了全體居民，凡了解情況的人們都說，不算被殺害的中國人，被殺害的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和祆教徒者竟達十二萬人……此四個教派的準確數字是能夠知道了，因為中國人是按人對這些外國人徵稅的。”[①] 黃巢在廣州城對外來宗教徒的屠殺，[②] 引發裏外來宗教在中國生存與發展的危機。

為什麼黃巢軍隊要屠殺外來教徒？這或許與當時的社會氛圍有關，據翰林學士劉允章以“九破”上書指陳國家問題或可看到這時的人民已經將蠻夷問題與民生問題做了聯繫，視放縱蠻夷在中國為國弱跡象之一：“國有九破，陛下知乎，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賄賂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③] 九破中的“蠻夷熾興”“廣造佛寺”“食祿人多”這些潛在的危機，都嚴重影響景教在中國的前景。

[①] 阿•克•穆爾：《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郝鎮華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83頁。[Arthur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translated by HAO Zhen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83.]另見張星烺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130頁。[ZHANG Xinglang, A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vol. 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130.]

[②] 至於黃巢何時入廣州，有各家說法，參見桑原騭藏：《唐宋貿易港研究》，楊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47-53頁；[Jitsuzo Kuwabara, *Tang Song mao yi gang yan jiu,* trans. YANG Lian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5), 47-53.]他主張應在乾符五年（878），其理由是根據《舊唐書•卷一七八•盧攜傳》、《南漢世家》，《新五代史•卷六五》皆云幹符五年，黃巢攻陷廣州。但韓國盤則提出中國有不少史料都記載為乾符六年，認為應該定在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參韓國盤：《隋唐五代史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377-381頁。[HAN Guopan, Sui Tang Wudai shi gang ya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377-381.]

[③] 劉允章：《直諫書》，載《全唐文•卷八零四》。[LIU Yunzhang, “Zhi jian shu,” in *Quan tang wen*, vol.804.]

從僖宗之後，經昭宗（888-904）、哀帝（905-907），約二十年唐朝覆亡。景教在中國的命運如何？在中國目前未有有關文獻發現，僅能根據一阿拉伯人默哈梅德（Mahamet）的記錄推測，他曾在987年在巴格達的一間教堂見到一名來自納及蘭（Najran）的年輕教士，該名教士曾在七年前（980）奉叙利亞東方教會法主之命與五位教士至中國整頓教會，但發現在中國的景教徒均已不存，教堂亦毀壞，祇好折返巴格達。[①]

景教文獻研究述評

文獻與文物是研究個人或群體最重要的歷史遺產，因為這可以提供後世追溯有關的歷史與面貌。景教石刻的出土與現存抄本的發現是研究景教極為重要的一環，因此在景教的研究大致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有關景教的來歷，另一是對景教有關石刻及抄本的考證與文本的研究，這兩者往往又密不可分，難以清楚地劃分。近年的研究，更多地致力於提高文獻可解讀性，故對文本的詞語有更細致地分析與詮釋，因此一方面需掌握景教的語言—叙利亞語、另一方面需對基督教的教理有相當的造詣，才能對景教文獻有更正確的解讀。

文物出土與相關研究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開啟了景教文物出土領域研究的序幕，先有明朝李之藻（1571-1630）從西安舉人張賡虞處獲得碑拓，拜讀後撰寫了《讀景教碑書後》，認為景教碑上所載內容是與耶穌會士所傳的“天學”相若。隨後有耶穌會士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44）於明思宗崇禎甲申年（1644）

[①] 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第20頁。[LUO Xianglin, Tang yuan er dai zhi Jingjiao, 20.]

撰著刊行的《唐景教碑頌正詮》，他主要是以教父著作及天主教的神學傳統闡釋碑文內容。

因未有其他景教文物的新發現，一直到晚清《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都是學者主要研究的文本，像是廣州沙基堂牧師楊榮鋕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刊印的《景教碑文紀事考正》三卷，主要是整理過去對景教碑的考正與解釋。及至二十世紀初，道士王圓箓及其助手楊果發現敦煌石室第十七窟藏有大量的歷代各種寫本和印本的經卷、經史子集等各類古籍、各類官私檔案、文學及各種民族文字文獻、佛像絹畫、供養絹畫、佛幡及各種銅、木佛像等文物，引起西方漢學學者們的關注。[①] 時有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敦煌石室挑選了一些價值較高的文本帶走，其中有一份景教抄本，即抄錄在同一卷上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及《尊經》。[②]

敦煌石室文獻的出土不單吸引漢學家們而來，同時也吸引了盜賊，使得文獻有轉售至黑市商販的危險，進而流入民間成為個人的藏品。黑市販賣使景教文獻流入不同的人手中，如日本人富岡謙藏（Tomeoka Kenzo）收藏的《一神論》、高楠順次郎（Takakusu Jinjiro）收藏的《序聽迷詩所經》，以及有“中國大藏書家”之稱的李盛鐸（1859-1937）收藏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及《志玄安樂經》，李盛鐸在《志玄安樂經》卷末題記“丙辰秋日於君歸自肅州以

[①] 陳國燦：《敦煌莫高窟與藏經洞的發現》，載《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5卷，第3期（2005年3月），第6-15頁。[CHEN Guocan, “The Discovery of the Library Cave and Mogao Grottoes,” in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vol. 15, no.3 (March 2005): 6-15]關於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過程，有諸多說法，見梁紅：《王道士流水疏沙與藏經洞的發現》，載《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0-124頁。[LIANG Hong, “Watering away the Sand by Taoist Wang and the Finding of the Hidden Library Cave in Dunhuang,” in *Dunhuang Research,* no.2 (April 2010): 120-124.]

[②] 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5-286頁。[Paul Pelliot, *Paul Pelliot Western Adventures* (Kunming: Yunnan Ren Min Press, 2001), 285-286.]

此見詒盛鐸記”，隱晦地表示經卷的來歷。由於轉售敦煌文獻有暴利可圖，敦煌經卷的偽品也在黑市市場流通販賣，如小島靖（Kojima Yasushi）持有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已被證明為偽作，另小島氏藏有的《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有學者認為偽卷，亦有人持相反意見，原件至今仍下落不明，無法據以判定真偽。

從上個世紀中葉至今景教出土的文物，從敦煌抄本轉移至景教徒之墓誌，如1955年出土於西安西郊西窰頭村的“大唐左神策軍故散副將游騎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兼試太常卿上柱國京兆米府君墓誌銘並序”[①]， 2006年在洛陽因盜墓而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經幢，[②] 2010年洛陽出土的《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志銘》及《唐故安氏夫人墓誌銘》等，[③] 這些新出土的石刻材料，提供了唐代景教徒的社會身分及生活地理的訊息。

學界研究概況

20世紀初，在景教的敦煌文獻陸續刊布以後，不少中外學者投入這批文獻的研究，如羽田亨（1885-1955）、佐伯好郎（Peter Yoshirō Saeki, 1871-1965）[④]、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⑤]、穆爾（A.

[①] 閻文儒：《唐米繼芬墓誌考釋》，載《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154-160頁；[YAN Wenru, “Tang MI Jifen mu zhi kao shi,” in *N.W. Ethno-National Studies*, no. 2 (1989): 154-160.]陝西省文物館理委員會：《西安市西窰頭村唐墓清理記》，載《考古》，1965年第8期，第383頁。[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haanxi, “Xian shi Xi Yao Tou Cun Tang mu qing li ji,” in *Archeology*, no. 8 (1965): 383.]

[②] 張乃翥：《跋洛陽新出土的一件景教石刻》，第7頁。

[③] 郭茂育、趙水森編：《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第211-214頁。

[④] 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東京：待漏書院，1911年。[Paul Yoshiro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Tokyo: Tairo Shoin, 1911).] 英文版見Paul Yoshiro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6).

[⑤]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PCK, 1929)；另參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雷立柏等譯，香港：道風書社，2009年。[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rans. Leopold LEEB, et al (Hong Kong: Logos and Pneuma, 2009).]

C. Moule, 1873-1957）[1]、林仰山（F. S. Drake, 1892-1974）[2]、龔天民[3]、劉偉民[4]、趙璧礎[5]、朱謙之（1899-1972）[6]、翁紹軍[7]、唐莉[8]、林悟殊[9]、劉振寧[10]、朱心然[11]、聶志軍[12]等學者著作。這些研究除了對景教

---

[1] Arthur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0); 另參中譯本，穆爾：《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郝鎮華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Arthur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trans. HAO Zhen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2] 林仰山：《唐代之景教文獻》，載《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1954年第7期，第3–11頁。[F. S. DRAK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Union Magazine,* no.7 (1954): 3-11.]該文原以英文刊於*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6, no. 11 (November 1935): 677-687; and vol. 66, no. 12 (December 1935): 738-742.

[3] 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輔橋出版社，1960年。[GONG Tianmin, *Christianity in the Tang dynasty* (Hong Kong: The Council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Overseas Chinese, 1960)]

[4] 劉偉民：《唐代景教之傳入及其思想之研究》，載《聯合書院學報》，1962年第一期，第25-33頁。[LAU Wai-man, "The Introduction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the T' ang Dynasty and its Ideology," in *United College Journal*, vol. 1 (1962): 25-33.]

[5] 趙璧礎：《就景教碑及其文獻試探唐代景教本色化》，載《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林治平主編，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第173-191頁。[CHIU Peter C. H., "Jiu Jingjiao bei ji qi wen xian shi tan Tangdai Jingjiao ben se hua," in *Christianinty and Chinese Indigenisation*, ed. LIN Zhi-ping (Taipei: Cosmic Light Holistic Care, 1990), 173-191.]

[6]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CHU Chien-chih, *The Nestorianism of China* (Beijing: Renmin Press, 1993).]

[7] 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卓越書樓，1995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WENG Shao-jun, *Sino-Nestorian Documents: Commentary and Exegesis* (Hong Kong: Zhuo yue shu lou, 1995;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8] TANG Li,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snf its Literature in Chines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2).

[9]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LIN Wushu, *Tangdai Jingjiao zai yan ji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10] 劉振寧：《始於"乖睽"終於"乖睽"：唐代景教"格義"軌跡探析》，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LIU Zhen-ning, *From Heterodoxy to Paradox: A New Study Approach to Nestorianism in Tang Dynasty* (Guiyang: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朱心然：《安身與立命：東方教會在華宣教史》，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9年。[CHU Sin-jan, *Being Human: The Church of the East Mission in China (635-1368)* (Hong Kong: Chines Baptist Press, 2009).]

[12] 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NIE Zhijun, *Word Research on the Nestorian Religion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Changsha: Hunan Renmin Press, 2010).]

的來歷及在唐、元發展的歷史有更充分的掌握以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對這批經典做出越來越細致的批注，甚至譯成好幾種不同的語言，如英文、日文、法文與義文等。過去前人所累積下來的研究成果，使得本文得以在這些豐碩的基礎上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正如前述，景教研究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有關景教的來歷及其有關歷史的探究，另一則是對景教有關石刻及抄本的考證與文本的研究，以下對這兩大部分的研究稍作介紹，便於讀者了解景教研究的走向。

歷史考證

在景教歷史的研究上，早期因中亞地區資料的匱乏，祇能從《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所記載的皇帝與年號作為理解景教與朝廷關係的互動，研究也多圍繞景教在唐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而對於景教的來歷較缺乏準確的說明。由於使徒多馬的傳說，歷史學者便以多馬曾到訪印度建立教會的傳聞，進而推測多馬也進入中國傳教的可能，然此說全無證據支持。及至後來18世紀末傳教運動的拓展，才使得叙利亞東方教會在美索不達米亞、中亞地區傳教的歷史與教會組織的發展為衆人所知，對此做出貢獻的有Thomas Yeates（1768-1869）、[①] John Mason Neale（1818-1866）、[②] George Percy Badger（1815-1888）[③] 等，他們的研究主要讓屬於一世紀使徒時代傳承下來的叙利亞東方教會得以被後世重新發現。

這幾位學者的豐碩成果，促進了耶魯大學的歷史學者賴德烈及其學生莫菲特（Samuel Hugh Moffett, 1916-2015）對於叙利亞東方教會在亞洲

---

① Thomas Yeates, *Indian Church History,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Planting of the Gospel in Syria, Mesopotamia, and India: With an accurate relation of The First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Lincoln's Inn., 1818).

② John Mason Neale, *A History Of The Holy Eastern Church* (London: Joseph Masters, 1847).

③ George Percy Badger, *The Nestorians and Their Rituals* (London: Joseph Masters, 1852).

的傳布進行更深入的探究，並梳理考證了這一支教派正是進入中國的景教，尤其莫菲特的《亞洲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一書將叙利亞東方教會的使徒統緒、在西亞及米索不達米亞等小國的傳布建立最早的基礎，以及如何漸與西方教會分道揚鑣，開始經營廣大的亞洲教區，在波斯建立總部，向中亞及東亞傳教，最後進入中國的歷史，都做了極為清楚的交代，景教的來歷至此已經相當清晰明朗。

文獻研究

有關石刻及抄本的考證與文本的研究，一如前述在歷史資料的匱乏下，在早期的研究難以做出紮實全面的考證，作為石刻材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因最早出土成為早期研究景教最重要的材料。對景教碑有較為詳細考訂注釋的有明末清初年間耶穌會士陽瑪諾的《唐景教碑頌正詮》，清末光緒年間的廣州沙基堂牧師楊榮鋕[①] 整理過去清代大儒、金石學家關於景教的考證及其個人批注景教碑的《景教碑文紀事考正》共三卷，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刊印。該書的卷一收錄了清代大儒、金石學家關於景教碑的討論，還包括了自中亞地區傳入中國外來宗教傳入的考訂，例如有開封府猶太教、祆教、婆羅門教、佛

[①] 楊榮鋕（1855-1919），字襄甫，祖籍番禺南步鄉，基督教人士。1879年在廣東倫敦會第七甫宣道所慕道，經湛羅弼牧師施洗入教。1878-1909年，先後主持佛山走馬堂8年，主持廣州沙基堂（惠愛堂前身）14年，孫中山常來沙基堂與他相叙。楊襄甫志在“人格建國”，在城西設大光書樓，廣收學子，還組織買書團分布於仁化、樂昌等10縣。他提倡華人自養自傳，通過募捐、變賣家產等方式籌款興建叢桂新街禮堂，該堂於1906年自立，為廣州市教會自養之始；1908年起，任廣州慈善會總理；1909年，受封為牧師，與謝恩祿等組織廣州青年會；1911年與劉子威等組建光華醫院；1915年任協和神學院教授。楊襄甫常引用儒釋之說與物理化學知識，以證道釋理，對知識分子很有吸引力。楊襄甫著有《釋疑匯編》、《四教創世考》、《舊約聖經綱要》、《大秦景教碑文頌考正》、《兩粵水災善後策》等。1919年在廣州去世，終年64歲。見《番禺市志(1992–2000)光盤檢索系統》，第三十一篇—“人物”，第一章“人物傳”（瀏覽日期：2014年4月9日），網址：http://www.pydfz.gov.cn/pysz/news.asp?class=760。[“Character biography” in *Panyu shi zhi* (1992-2000), Accessed April 9, 2014, http://www.pydfz.gov.cn/pysz/news.asp?class=760]

教、伊斯蘭教及摩尼教等；卷二及三則是作者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以聖經加上前人研究的成果來解釋景教的教義、禮儀等內容。

由於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各種考證與解讀，碑文上對於中國古籍經典的用典或借用，成為學者的另一關注點，這代表景教入華後，對於漢語的掌握漸趨成熟，而各種的引經據典也意味着景教在漢語語境中表達基督教信仰的一種嘗試與努力，當中的代表著作有夏鳴雷神父（Henri Harvet, 1848-1901）的《西安府基督教碑》（*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①]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景教文獻，其刊布是自清末直到民國時期的1930年代前後，使景教的研究被推進至另一個新的階段。這些文獻的發表，對景教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並未產生太多的補充或影響，主要的影響是讓景教研究轉移至景教的經典脈絡之中，從現存的景教文獻來觀察其在中國如何的跨文化、跨宗教、本地化；而在同時，學者除了對於文本的關注之外，也開始關注通史性的著作或將文獻與歷史整合來建構景教的東漸史，如英國學者A. Mingana（1878-1937）於1925年發表的《基督教在中亞和遠東的早期傳播：一個新文獻》（*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②]、穆爾在1930年出版的《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③]、 還有佐伯好郎的《景教の研究》[④]、1992年朱謙之的《中國景教》（實際上成書於1966年），其中佐伯氏

---

① Henri Havret, *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02).

② A. 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25).

③ Arthur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另有中譯本阿•克•穆爾：《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郝鎮華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④ 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東京：發賣所文求堂專店，1935年，附錄頁1–220。[Peter Yoshiro Saeki, *Kei kyō no kenkyū* (Tokyo: Toho Bunka Gakuin, 1935).]

的《景教の研究》一書附錄達220頁，將許多中國史籍中涉及中亞地區的史地資料詳細排列，供後學以作參考之用。自此以後，景教研究進入了一個長時間的停頓期，該領域的研究沒有太大的進展及轉變，甚至幾近停頓。1995年翁紹軍編著的《漢語景教文典詮釋》出版，其實祇整理了先前幾位學者在文本上所作的批注，翁氏本人並未提出個人見解。

進入21世紀以後，景教研究又再次崛起，多部著作相繼出版，林悟殊的《唐代景教再研究》[①] 對於敦煌景教文獻作出真偽的甄別，但主要以“外證”的考證，但對於“內證”較缺乏足夠的左證。其中小島靖所收藏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大秦景教通真歸法贊》被他及榮新江視為偽卷，[②] 而2006年《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經幢的出土佐證了他視《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為偽卷的觀點，並強調研究景教絕不可建立在偽卷上的嚴格觀點。

接下來較受矚目的研究有聶志軍的《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③]，他從語言學的視角考究各篇景教文獻的字詞、用語，再按照景教、儒家、道教及佛教的分類分析字詞的來源，把景教置於宗教語言攙雜的語境中來理解。與《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類似的著作有劉振寧的《始於“乖睽”終於“乖睽”：唐代景教“格義”軌跡探析》，[④] 他致力於研究景教在三位一體和基督教教義的轉譯過程語境的轉變，其觀點在於認為景教在外貌形體學了中國的宗教，最後卻失去了本義。[⑤] 這兩部著作所作的嘗試或許仍有未盡人意之處，但在對於研究領域的

---

①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② 詳見林悟殊：《所謂李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載《唐代景教再研究》，第156-174頁。

③ 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 劉振寧：《始於“乖睽”終於“乖睽”：唐代景教“格義”軌跡探析》，貴州：貴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⑤ 劉振寧：《始於“乖睽”終於“乖睽”：唐代景教“格義”軌跡探析》，第183-184頁。

拓展，卻是新的嘗試。前者所可惜的，對儒、釋、道三家做了不少的討論，但對基督教欠缺深入的探討；後者則嘗試在基督教的古典脈絡下審視景教在中國所表達的思想，但始終沒有釐清景教在基督教中所屬的真正教派，也未站在唐代政治、宗教政策背景下，對景教作出更多合理的解釋。

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之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朱心然的《安身與立命：東方教會在華宣教史》[①]，朱心然該書不僅確立了景教所屬的真正教派及其神學特徵，又以較具同情的態度看待景教必須面對中國複雜的政教關係，並嘗試把景教置入一個更大的文化、思想脈絡之下去作分析，包括了唐代宗教對話的處境，各宗教之間的互動、相互在教義、思想上的吸納與重新詮釋，提出景教在中國與其他宗教之間隱含着一種微妙的互動關係，既有競爭又有合作。

結語

景教（叙利亞東方教會）進入中國的時間為唐代，是歷史上一個相當特別的時間點。一方面此時中國處於文明的高峰，也是宗教迅速發展的時期，另一方面叙利亞東方教會在中亞地區面臨波斯薩珊王朝的衰亡、阿拉伯伊斯蘭教帝國的興起，整個生存環境的劇變使得遷移成為教會迫在眉睫的事。叙利亞東方教會作為最早和中國文化接觸的基督教分支，得益於歷史與環境的因素，早已有豐富的與大國交手的經驗。他們來到中國之後，先後被官方稱為“波斯教”、“大秦教”，從這些稱呼來看，這支基督教派在傳教上歷經了不同的大國文化，在其傳播的過程，明顯地經歷了希羅文化與波斯文化，可見所交手的大國有羅馬與波斯這兩大帝國。在波斯帝國衰亡之際即七世紀初，他們踏上中國土地時，已經是第三度面對大國文化了，過去他們

[①] 朱心然：《安身與立命：東方教會在華宣教史》，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9年。

處於波斯薩珊王朝統治下，國家宗教是祆教，他們深知不可能改變統治者的宗教信仰，但又必須設法尋求生存與發展的文化經驗，這些長期累積下來的經驗或多或少有助於他們與中國的統治者交手，從唐太宗至高宗禮遇景教大致可看出他們擅於與統治者打交道。

再從歷史的走向來看，景教背後所代表的叙利亞東方教會從教會發展的濫殤時期即具有東方教會的神學特徵，特別是與安提阿學派有着一脈相承的神學思想傳統。在聶斯脫利事件發生的前三十年，他們因着建構自己的組織以及召開教會會議，漸與西方教會分道揚鑣。聶斯脫利事件發生後，更加催化他們脫離西方教會，以致於西方教會在五世紀後對他們的傳教與發展越來越陌生，甚至到後來不曉得有此教派的存在，形成了研究景教源流的難題。由是之故，理解景教之前必須先對叙利亞東方教會源流及其種種有正確的掌握，方能對景教歷史及其留存的經典有正確地解讀。

本文即站在前述的考慮之上進行，唐代的景教文獻距今遙遠，特別是初入中國的景教寫本在解讀上有一定的困難，但中後期的寫本及有關的材料，相對容易許多。我在閱讀現有的景教文獻時，發現一個不忍苛責的事實，即景教所傳播的宗教思想似乎不能打動庶民。衆所周知，語言是思想與宗教信仰的載體，但他們呈現的流暢通達的漢語作品實在過少，大部分多屬於生硬之作。景教晚期，中國全面陷入內亂並大量屠殺外族人時，他們撤離了中國，傳教和這一宗教信仰也隨着撤離，景教始終未能在庶民文化裏生根。由學者的研究可知，叙利亞東方教會在波斯存在了四百年，將基督教經典譯成許多中亞語文，如波斯語、粟特語、回鶻語等，卻在中國存續的三百年間裏，始終未能完成一套完整的成熟的適於中國各階層閱讀的漢語基督教作品。

總體來說，景教在中國種種的努力與試驗，是基督教與中華文化第一次的互動與衝撞，其所遺留下的各種作品，不管成熟與否，都是基督教在中國的開山之作，這些作品，不僅有着以古鑒今的意義，也有助於全面檢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附表：大秦景教遺文列表

寫本名稱	性質	錄文年份	作者	大小／字數	收藏館
《序聽迷詩所經》	抄本	貞觀十五年（638 年）或更早	可能為阿羅本及其傳教團	170 行，2845 字	日本杏雨書屋
《一神論》	抄本	貞觀十五年（641 年）①	可能為阿羅本及其傳教團	405 行，6949 字	日本杏雨書屋
《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②	抄本	開元八年五月二日（720 年）	索元（抄）	18 行，188 字	日本同志社大學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碑刻	建中二年（781 年）	景淨（述）呂秀岩（書）	楷書 32 行，1780 個漢字，另有叙利亞文字	中國西安碑林博物館
《大秦景教宣元本經》	抄本	唐德宗時代（779-805）③	可能為景淨	26 行，465 字	日本杏雨書屋
《志玄安樂經》	抄本	唐德宗時代（779-805）④	可能為景淨	159 行，2596 字	日本杏雨書屋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	抄本	唐德宗時代（779-805）⑤	可能為景淨	24 行，327 字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Pelliot Chinois 3847
《尊經》	抄本	不詳	可能為景淨	18 行，277 字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Pelliot Chinois 3847
《唐故安氏夫人墓誌銘》	墓誌	長慶元年十月二十二日（821 年 11 月 20 日）	文簡	22 行，427 字 長、寬各 30 釐米，附有“大唐故夫人安氏墓志”的墓誌蓋	拓片藏於洛陽碑志拓片博物館
《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	墓誌	大和二年二月十六日（828 年 3 月 9 日）	文簡	27 行，690 字 長、寬各 53 釐米，附有“唐故花府君公墓志銘”的墓誌蓋	拓片藏於洛陽碑誌拓片博物館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與經幢記	經幢	大和三年（829 年）	文翼（述）	殘存經幢最長部分 81 釐米，最短部分 59 釐米，八棱，周圍 112 釐米。	中國洛陽市博物館

① 《一神論》錄文中記述：“……此等向天下，世尊聖化，行亦無幾多時，所以分明，自爾已來，彌師訶向天下見，也向五蔭身，六百四十一年不過已，於一切處……”

② 小島靖聲稱《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贊》是購自李盛鐸，而在1945年9月於天津撤離之際，與部份貴重物品同時被盜。因此日本同志社大學所收藏品為原件照片，參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第158頁。

③ 《尊經》翻經目錄中有此經名，故可能完成於景淨活躍的時代。

④ 《志玄安樂經》亦出現在《尊經》翻經目錄，行文成熟，其用語、結構諸多與《六波羅蜜多經》相仿，故可能完成於貞元二年至四年（786-788年）後，為景淨在佛教譯場中參與翻經之時。

⑤ 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推斷等同《尊經》目錄中《三威贊經》，以目錄排序估計是八世紀末期的作品，見Paul Pelliot,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in *T′oung Pao*, vol.15 (1914): 626.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Badger, George Percy. *The Nestorians and Their Rituals*. London: Joseph Masters, 1852.

Havret, Henri. *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02.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Mingana, 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25.

Moule, Arthur C.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30.

Neale, John Mason. *A History Of The Holy Eastern Church*. London: Joseph Masters, 1847.

Saeki, Paul Yoshiro.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6.

Tang, Li.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s snf Its Literature in Chines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2.

Yeates, Thomas. *Indian Church History,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Planting of the Gospel in Syria, Mesopotamia, and India: With an accurate relation of the First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Lincoln's Inn., 1818.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常書香：《洛陽市首次發現唐代景教徒墓誌》（2014年5月7日）刊於洛陽網，最後瀏覽2014年5月17日，網址：http://news.lyd.com.cn/system/2014/05/07/010318494.shtml 。[CHANG Shuxiang. “Luoyang shi shou ci fa xian Tangdai Jingjiao tu mu zhi.” In *Luoyang Daily* (May 7, 2014), Accessed May 17, 2014, http://news.lyd.com.cn/system/2014/05/07/010318494.html.]

陳國燦：《敦煌莫高窟與藏經洞的發現》，載《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5卷，第3期（2005年3月），第6-15頁。[CHEN Guocan. “The Discovery of the Library Cave and Mogao Grottoes.” In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vol. 15, no.3 (March 2005): 6-15.]

陳垣：《陳垣史學論著選》，陳樂素、陳智超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CHEN Yuan. *CHEN Yuan shi xue lun zhu xuan*. Edited by CHEN Lesu, CHEN Zhicha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CHU Chien-chih. *The Nestorianism of China*. Beijing: Renmin Press, 1993.]

朱心然：《安身與立命》,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09年。[CHU Sin-jan. *Being Human: The Church of the East Mission in China (635-1368)*. Hong Kong: Chinese Baptist Press, 2009.]

陝西省文物館理委員會：《西安市西窰頭村唐墓清理記》，載《考古》，1965年第8期，第383頁。[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haanxi. "Xi'an shi Xiyaotou cun Tang mu qing li ji." In *Archeology*, no. 8 (1965): 383.]

端方：《陶齋藏石記》，載《石刻史料新編》，第11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2年。[DUAN fang. *Taozhai cang shi ji*, in *Shi ke shi liao xin bian*, vol. 11.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Co., 1982.]

番禺區地方志辦公室編：《番禺市志(1992–2000)光盤檢索系統》，第三十一篇人物，第一章人物傳（瀏覽日期：2014年4月9日），網址：http://www.pydfz.gov.cn/pysz/news.asp?class=760。[Fanyu di fang zhi office. "Character biography." In *Fanyu Shi zhi (1992-2000)*, Accessed April 9, 2014, http://www.pydfz.gov.cn/pysz/news.asp? class=760.]

葛承雍：《唐代長安一個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181–186。[GE Chengyong. "Tangdai Zhangan yi ge Sute jiating de Jingjiao xin yang." In *Historical Research*, no.3 (2001): 181-186.]

葛承雍編：《景教遺珍：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GE Chengyong, ed. *Precious Nestorian Relic: Studies on the Nestorian Stone Pillar of the Tang Dynasty Recently Discovered in Luoya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

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香港：基督教輔橋出版社，1960年。[GONG Tianmin. *Christianity in the Tang dynasty*. Hong Kong: The Council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Overseas Chinese, 1960.]

郭茂育、趙水森編：《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GUO Maoyu & ZHAO Shuisen, eds. *Luoyang chu tu yuanyang zhi ji lu*.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2.]

韓國盤：《隋唐五代史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HAN Guopan. *Sui Tang Wudai shi lun j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孔凡禮點校：《西溪叢語，家世舊聞》，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2頁。

[KONG Fanli, ed. *Xi qi cong yu, Jia shi jiu 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桑原騭藏：《唐宋貿易港研究》，楊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Kuwabara, Jitsuzo. Tang Song mao yi gang yan jiu. Translated by YANG Lian.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5.]

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雷立柏等譯，香港：道風書社，2009年。[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ranslated by Leopold LEEB, et al. Hong Kong: Logos and Pneuma, 2009.]

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官制》，載《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第184-185、192-195頁。[LAI Sweefo. "On the Jianjiao Titles under the Tang Dynasty." In *Chinese Studies* 24, no.1 (2006): 184-185, 192-195.]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LI Linfu, et al., ed. *Tang liu dian*. Revised by CHEN Zhongf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林仰山：《唐代之景教文獻》，載《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1954年第7期，第3–11頁。[DRAKE, F. S.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Union Magazine*, no. 7 (1954): 3-11.]

林治平編：《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LIN Zhiping, ed. *Christianinty and Chinese Indigenisation*. Taipei: Cosmic Light Holistic Care, 1990.]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LIN Wushu. *Tangdai Jingjiao zai yan ji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梁紅：《王道士流水疏沙與藏經洞的發現》，載《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0-124頁。[LIANG Hong. "Watering away the Sand by Taoist Wang and the Finding of the Hidden Library Cave in Dunhuang." In *Dunhuang Research*, no.2 (April 2010): 120-124.]

劉偉民：《唐代景教之傳入及其思想之研究》，載《聯合書院學報》，1962年第一期，第25-33頁。[LAU Wai-man, "The Introduction of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Ideology." In *United College Journal*, vol. 1 (1962): 25-33.]

劉振寧：《始於"乖睽"終於"乖睽"：唐代景教"格義"軌跡探析》，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LIU Zhenning. *From Heterodoxy to Paradox: A New Study Approach to Nestorianism in Tang Dynasty*. Guiyang: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7.]

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年。[LUO Xianglin. *Tang Yuan er dai zhi Jingjiao*. Hong Kong: Zhongguo xue she, 1966.]

羅香林：《景教徒阿羅憾等為武則天皇後營造頌德天樞考》，載《清華學報》，新1卷，第3期，1958年9月，第13-24頁。[LO Hsiang-Lin. "The Sung-Te Tien-Shu Built by the Nestorian, Abraham, and Others in Honor of the Empress Wu Tse-Tien." I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new vol. 1, no. 1 (September 1958): 13-24.]

馬小鶴：《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MA Xiaohe. *Moni jiao yu gu dai xi yu shi yan jiu*.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毛陽光、余扶危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匯編（上下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MAO Yangguang & YU Fuwei, eds. *Luoyang liu san Tangdai mu zhi hui bian*.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3.]

毛陽光：《洛陽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獻及其妻安氏墓誌初探》，載《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第85-90頁；附墓誌圖版。[MAO Yangguang. "A Study on the Epigraph of Nestorian Hua Xian and his Wife Ann of Tang Dynasty from Luoyang." In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no. 2 (2014): 85-90; appendix with the rubbings of epigraph.]

阿•克•穆爾：《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郝鎮華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Moule, A. C.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Translated by HAO Zhen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聶志軍：《唐代景教文獻詞語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NIE Zhijun. *Word Research on the Nestorian Religion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Changsha: Hunan Renmin Press, 2010.]

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險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Pelliot, *Paul. Paul Pelliot Western Adventures*. Kunming: Yunnan Ren Min Press, 2001.]

邱樹森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QIU Shusen, ed. *Zhongguo li dai zhi guan ci dian*.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1.]

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東京：待漏書院，1911年。[Saeki, Peter Yoshiro.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Tokyo: Tairo Shoin, 1911.]

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東京：發賣所文求堂專店，1935年。[Saeki, Peter Yoshiro. *Kei kyō no kenkyū*. Tokyo: Toho Bunka Gakuin, 1935.]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WANG Pu. *Tang hui y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5.]

翁紹軍：《漢語景教文典詮釋》，香港：卓越書樓，1995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WENG Shaojun. *Sino-Nestorian Documents: Commentary and Exegesis*. Hong Kong: Zhuo yue shu lou, 1995;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閻文儒：《唐米繼芬墓誌考釋》，載《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154-160頁；[YAN Wenru. "Tang MI Jifen mu zhi kao shi." In *N.W. Ethno-National Studies*, no. 2 (1989): 154-160.]

葉奕良主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YE Yiliang, ed.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張星烺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ZHANG Xinglang,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vol.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8.]

趙振華主編：《洛陽出土墓誌研究文集》，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ZHAO Zhenhua, ed. *Luoyang chu tu mu zhi yan jiu wen ji*. Beijing: Blossom Press, 2002.]